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主编 苏长和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Crisis Management:
A Study of Preemption

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

孙德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主编 苏长和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Crisis Management:
A Study of Preemption

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

孙德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孙德刚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苏长和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09091 - 0

I. 危... II. 孙... III.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IV. D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1754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陈 雷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

苏长和 主编

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

孙德刚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1.5 插页 3 字数 369,000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091 - 0/D · 1683

定价 38.00 元

总 序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其前身为国际问题研究所,更早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研究院成立以来,得到兄弟院校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和学术前辈的鼓励和支持。我院具有较悠久的国别、区域和外交史研究传统,研究人员的语言优势极为明显(国际关系学科点研究人员掌握的语言总共有9种),研究院这几年除了开拓新兴研究领域(国际组织研究、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以外,对传统的国别、地区和外交史研究依旧格外珍惜,丝毫不作偏废,并且鼓励研究人员借鉴多学科、多方法途径,争取在这些传统研究领域上做到有所发展和超越。所谓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就是整合研究院学者这些年在已有传统领域的个人研究成果,试图反映全球化时代战略、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新变化所做的一个尝试。

丛书缘起于我院韦宗友副教授2006年开始主持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外交类型研究”(项目编号:KX161004),他对丛书的出版,功不可没。项目最初规划的时候,主题涉及经济制裁外交、强制外交、先发制人、准联盟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援助外交等。该项目现在已陆续结项,我们择其研究精华,纳入本丛书。当然,丛书并不限于战略和外交部分,我们觉得,当代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用于国际关系进程的行为体越来越多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地方政治与全球政治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各种议题之间相互交织的程度越来越深,文明之间的对话越来越迫切,各大区域的一体化走势越来越明显,各种国际政治思潮的竞争越来越复杂,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进入国际关系学者的思存视野,需要我们给予学理关注。我们学力不逮,因此,丛书不可能包罗所有这些问题研究,但是,就其中某些问题做出我们的思考,还是可能的。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丛书定名为“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自以为,“增信去兵”是外交的最主要目的,而如何将对手变成朋友而不是消灭对手,则是战略的最高境界。这两点是中国古今战略文化和外交文化的精髓。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存。国际社会通过人文沟通和外交互动,能够更多地“足

信”，而不是将精力放在“足兵”上，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发展，这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应有之义。学者们方法不一，观点各异，但所谓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此“公”于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秉“公”研究意味着抱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尽心尽力，为国家和人类治理增信释疑、趋善避恶，贡献出自己的思考。我想，这也是我们丛书作者共同持有的一个研究理念吧。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曙光副校长自始至终关心“当代外交类型研究”项目和本丛书的进展工作，当初项目规划时，他就投注了大量的心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和校国际关系博士点负责人胡礼忠教授，一直给予我们新生的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以关心、照顾和支持。三位前辈为上外国国际关系学科做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我代表研究院对他们表示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赵荔红女士作为这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其专业、敬业、乐业的精神让人敬佩，她是这套丛书最合适不过的编辑了。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学界朋友给予这套丛书以批评、建议，更好地帮助我们编好这套丛书。

苏长和

2009年11月5日于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目 录

绪论.....	1
---------	---

上篇 危机中的战略选择——先发制人战略理论研究

第一章 国家安全战略与当代先发制人研究的主要学派	21
第一节 国际军事学与先发制人	21
第二节 国际伦理学与先发制人	31
第三节 国际法学与先发制人	39
第四节 国际政治学与先发制人	46
小 结	54

第二章 危机管理中先发制人战略宏观理论考察	57
第一节 先发制人战略的概念界定	57
第二节 先发制人战略的思想渊源	65
第三节 先发制人战略的内在逻辑	71
第四节 先发制人战略的具体实践	75
小 结	78

第三章 危机管理中先发制人战略微观理论探析	80
第一节 必要性:安全威胁.....	81
第二节 可行性:综合实力.....	87
第三节 合法性:国际舆论.....	99
第四节 威权性:政治制度	104
小 结.....	107

中篇 传统安全、危机管理与先发制人战略实证研究

第四章 应对生存危机:以色列对阿拉伯邻国的先发制人战略	111
第一节 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的酝酿.....	112

第二节 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	126
第三节 以色列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促进因素·····	134
第四节 以色列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制约因素·····	142
小 结·····	147

第五章 应对领土危机:埃及对以色列的先发制人战略 ·····	149
第一节 埃及先发制人战略的酝酿·····	151
第二节 埃及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	161
第三节 埃及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促进因素·····	167
第四节 埃及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制约因素·····	177
小 结·····	181

第六章 应对核危机:以伊对抗阴影下的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 ·····	183
第一节 以伊对抗的特点与以色列先发制人传统·····	184
第二节 伊朗核问题及其对以色列安全的影响·····	189
第三节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促进因素·····	196
第四节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制约因素·····	199
小 结·····	209

下篇 非传统安全、危机管理与先发制人战略实证研究

第七章 应对民族分裂危机:土耳其对库工党的先发制人战略 ·····	215
第一节 土耳其制定先发制人战略的历史背景·····	217
第二节 土耳其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主要过程·····	223
第三节 土耳其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促进因素·····	238
第四节 土耳其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制约因素·····	248
小 结·····	253

第八章 应对无政府危机:埃塞俄比亚对法院联盟的先发制人战略 ·····	256
第一节 法院联盟对埃塞俄比亚安全的影响·····	257
第二节 埃塞俄比亚先发制人战略的制定·····	265
第三节 埃塞俄比亚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促进因素·····	275
第四节 埃塞俄比亚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制约因素·····	284

小 结.....	288
结 论.....	291
第一节 危机管理中先发制人战略研究的基本结论.....	292
第二节 危机管理中先发制人战略研究的主要发现.....	308
小 结.....	314
参考文献.....	320
一、中文参考文献	320
二、英文参考文献	322
附录 国外人名专有名词中英文参照.....	333
后记.....	336

绪 论

一、研究 对象

21 世纪初期,危机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常态。主权国家内部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同时国际社会也面临着深刻的国际体系转型。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双重影响,主权国家内部权力结构和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本书主要考察国际危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核心内容,它既受国际格局的影响,又推动国际格局的变迁。本书将当前各大国不平衡动态性增长所形成的特殊国际格局界定为“后一超多强格局”。“后一超多强格局”是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的漫长历史中的过渡阶段,既是对一超多强格局的超越和发展,又为将来多极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①推动“后一超多强格局”产生的,主要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区域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多样化与世界主要矛盾的转变(由“反霸”、“反恐”到“维护综合安全”)。“后一超多强格局”显示出全球权力格局演变的四大趋势:1. 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大国的相对衰弱;2.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3. 以中小国家联合自强为特征的区域组织的进一步发展;4. 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必将导致国际体系的变迁,也将导致国际危机的频繁爆发。如何加强危机管理、制定恰当的安全战略,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议题。^②

① 孙德刚:《“后一超多强格局”的基本态势》,《中国国防报》,2009 年 8 月 25 日,第 9 版。

②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中心:《国际危机管理概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郑伟:《国际危机管理与信息沟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版;Gilbert R. Winham, *New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Gregory F. Treverton,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Super-powers in the Middle East*, Montclair, N.J.: The Adelphi Library, 1981。

危机管理是专门的管理科学,它是为应对突发危机事件、抗拒突发性灾难事变、尽力使损害降至最低点而事先建立的防范、处理体系和应对的措施。^①在危机管理过程中,领导人需要选择恰当的国家安全战略。归纳起来,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主要包括外交斡旋战略、政治谈判战略、经济制裁战略、军事遏制战略、武力胁迫战略和先发制人战略六种手段。^②其中前三项属于和平手段,或者说是政治战略,以政治谈判为基础;后三项属于非和平手段,或者说是军事战略,以先发制人为基础。

先发制人战略研究既涉及危机管理,又属于国家应对危机的战略选择,属于军事学、战略学和外交学的交叉学科。新时期,军事因素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印度学者辛德所言:没有武器的外交犹如没有乐器的音乐。无论是作为军事手段的先发制人战略还是作为政治手段的谈判战略,都是化解危机的重要手段,都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选项。

在危机管理中,决策者选择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化解危机,主要不是取决于领导人个人偏好,而是取决于各种战略在解决国际危机中的成本、风险、绩效和收益。为研究需要,本书将危机管理中,决策者的国家安全战略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两种战略选择:实施先发制人战略(依靠军事手段)和放弃先发制人战略(依靠政治手段),并认为领导人的战略选择受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行性(实施国的综合实力)、必要性(实施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强度)和合法性(实施国采取军事行动在国际上的支持度)的共同影响。决策者对上述因素的综合考量过程就是对先发制人战略成本、风险、绩效和收益的权衡过程,其结果是国家要么选择先发制人战略,要么放弃先发制人战略(见图 0-1)。

先发制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术语,如歌曲《先发制人》强调指出:“一秒钟,不要等,一秒钟,一秒钟,已决定,胜利谁属。一秒钟,会是谁,抢先进攻,就看谁,先发制人,毋须悔恨,迟出手的人,遗下血泪印,就看谁先发制人。”这首歌以通俗的方式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先发制人优于后发制人。

① “危机管理”,<http://wiki.mbalib.com/wiki/%E5%8D%B1%E6%9C%BA%E7%AE%A1%E7%90%86>。

② 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刘静波:《21 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年版;赵丕、李效东主编:《大国崛起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杨毅:《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 年版;Stephen J. Cimbal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hoices and Limits*, New York: Praeger, 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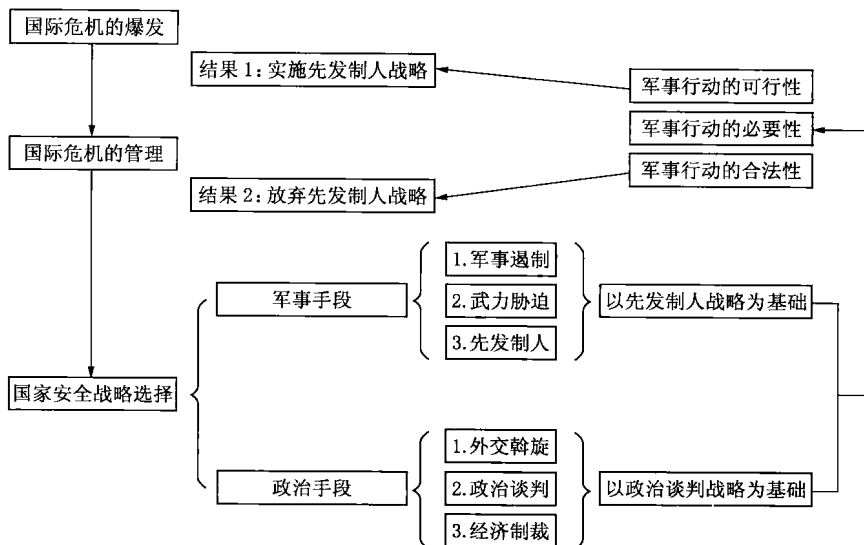


图 0-1 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先发制人是应对国际危机、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选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然而,当今世界远未太平,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非传统威胁的多元化和国家利益的国际化客观上要求中国政府在制定安全战略时与时俱进。如何加强中国综合安全、充分利用未来 20 年战略机遇期、努力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议题。中国政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和平与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呈现日益复杂化趋势。《2008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围绕战略资源、战略要地和战略主导权的争夺加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地区动荡扩散,热点问题增多,局部冲突和战争此起彼伏。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加深,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粮食等问题严峻,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风险的联动性、系统性、全球性特点明显。恐怖主义、环境灾难、气候变化、严重疫病、跨国犯罪、海盗等问题日益突出。”^①中国外交应对这些威胁的手段是什么?有哪些可供支配的内外部资源?可以借助怎样的机制?

在学术界,随着外交的外延不断扩大,外交类型的研究也不断丰富。新时期中国外交是统筹国内外各种资源的大外交,尤其是中国外交部与国防部、商务部等职

^① 《2008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 年版,第 1 页。

能部门亟需实现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按照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局统筹规划。“9·11”以来,随着中国的军事战略与安全战略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间界限日益模糊,尤其表现为先发制人从一项军事战略向安全战略演变这一特征上。先发制人过去常被视为一种军事战略,现在却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已故的布什政府白宫发言人托尼·斯诺(Tony Snow)曾经说过:“现在把先发制人理解成战争是一种误解。先发制人意味着在某些人能对你造成伤害之前制止他们。先发制人不仅是一种军事学说,也是一种外交战略。”^①《孙子兵法》虽未使用先发制人这种表述,但却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②指出用兵的上策是击破敌人的计谋和外交。本书试图打破传统军事战略与安全战略之间的藩篱,提出“先发制人战略”这个概念,研究其基本内涵、特征、动因和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先发制人战略,系指国家面临严重威胁时,以预先打击为方式,抢先对威胁采取主动化解的战略理念、机制和行为的总和。^③从定义来看,先发制人战略具有以下6个基本要素:1.先发制人战略的主体是国家,客体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这使它有别于任何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行为;2.先发制人战略的动机是应对外部严重威胁,这使它有别于预防性防御,后者指向遥远威胁;^④3.先发制人战略的手段是预先打击,而不是威慑或胁迫,这使它有别于各种非暴力手段的危机管理;^⑤4.先发制人战略的目的是主动化解威胁,这使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侵略战争;5.先发制人战略的本质是安全战略,或曰文官主导下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其主要执行和协调机构是外交部和国防部,这使它有别于作为狭隘军事层面的军事战术与军事策略;6.先发制人战略是广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概念。本文

① “美重新定义‘先发制人’:不限于军事也是外交战略”,2006年7月12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junshi/1272507.htm>。

② 《孙子兵法·谋攻篇》。

③ 先发制人战略已在学界引起一定关注,但人们尚未对其加以严格界定和学理探讨。有学者认为,小布什的“牛仔外交”实际上就是“先发制人战略”,内贾德执政后伊朗对以色列采取的外交攻势也是先发制人战略,参见“Preemptive Diplomacy from Ahmadinejad?”, May 28, 2006. <http://www.inthebullpen.com/archives/2006/4835>。也有学者认为先发制人战略就是预防性外交,参见 Laity Mark, *Preventing War in Macedonia: Pre-Emptive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④ 这里的严重威胁有双重含义,一是威胁对国家的利益来说是致命性的,二是威胁具有紧迫性。本书并未使用迫在眉睫威胁这一界定标准,一是因为它难以衡量,二是因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迫在眉睫威胁案例。

⑤ 不可否认的是,先发制人战略的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有学者把美苏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归入核威慑政策的范畴。限于篇幅,此书不研究其威慑作用。

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是军事战略与安全战略的结合体,是应对国际危机、管理风险的手段。

先发制人战略的基本模式是: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内心产生挫折感——努力寻求化解威胁的途径——对各种手段的效能加以综合评估——联合与统筹各职能部门——对各种可支配资源加以整合——选择预防性打击措施——化解国家面临的威胁。先发制人战略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理论基础。首先,其战略文化根源于民族中心主义,即认为“我们”是善的,属受威胁方,“他们”是邪恶的,属威胁方,“善”对“恶”的打击是天经地义的。^①按照此逻辑,先发制人战略是善者拥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正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所说:“如果你看到一条即将发起攻击的响尾蛇,你不会等它先进攻后再制服它”^②,先发制人就是文明的人对邪恶的蛇的正义打击。其次,这种强势文化心理还与特定国家的政治文化存在关联。例如,对于强调普遍主义、道德主义和例外论的美国来说,先发制人战略无疑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文化。

先发制人战略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却属于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前所述,国家面对严重威胁时至少有四项战略——谈判外交、威慑外交、强制性外交和先发制人(见表 0-1)。从行为模式来看,如果说前三项措施旨在维持国际关系现状,第四项则是为了改变国际关系现状。

表 0-1 预防性战略的主要类型

特征 类别	内在逻辑	主要目的	所需成本	预期结果
谈判	谈判可以让冲突方相互作出让步,实现共赢	维持现状	成本低,风险小,效率低	和平
威慑	受遏制国不采取行动的收益大于采取行动的收益	维持现状	成本较低,风险较小,效率较低	冷和平
强制	受遏制国按照遏制国的意志采取行动的收益大于不采取行动的收益	通过威胁使用武力试图恢复原有权力关系	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效率较高	国际危机
先发制人	遏制国采取行动的收益大于不采取行动的收益	改变现状	成本高,风险大,效率高	战争

① 欧阳超:《先发制人与国际法》,《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第14页。

② Howard M. Hensel, ed., *The Legitimat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he Just War Tradition and the Customary Law of Armed Conflict*, Hampshire: Ashgate, 2008, p. 103.

先发制人意味着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可分为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在敌人发动攻击前抢先袭击对手即为先发制人,而采取报复性打击行为通常称为后发制人,酝酿先发制人打击的过程就是先发制人战略的谋划过程。国家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主要原因是各种政治力量消长变化,尤其是权力增长速度出现不均衡性,权力关系随实力消长变化而发生改变。对于实力处于相对下降趋势的国家而言,该国与敌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或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随时间推移日益对本国不利,且敌人的严重威胁逐步演变为迫在眉睫威胁。所以,为改变这种消极的发展趋势,该国通常在权力关系发生巨变或在敌人实施侵略前抢先采取积极行动,以努力维持对自身有利的权力关系。先发制人战略实施者最终旨在改变权力变化的曲线,阻止其发生逆转。

先发制人战略本身是中性的,并无好坏、善恶之分,其合法性取决于运用此战略的主体、时间和空间。先发制人从理论上讲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范畴,决策者必须在先发制人战略与侵略战争之间标出明显的界限,防止滑向过度扩张的政策。如果决策者坚信,进一步扩张会增强自身的军事安全,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战争爆发后,他国通常只会选择中立、观望而不是联合抵制政策,^①先发制人战略就会被滥用。由此可见,先发制人战略是一类特殊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外在表现来看,它属于咄咄逼人的进攻,具有军事战略的特性;从实施国的意图来看,它又属于积极的防御,具有防御战略的属性。由于先发制人战略具有这种双重特性,其在酝酿和实施过程中常伴随激烈争论,其焦点是合法性问题。

二、文献综述

先发制人是决策者应对国际危机、预防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提出了选择性干预的假设,并认为选择性干预是大国处理热点问题的重要手段。^②作为一种手段,先发制人在冷战期间及后冷战时期频繁出现在国际安全舞台上,美、俄、英、法、中等大国都曾实践过此战略。先发制人战略其

① 杰克·斯奈德:《敌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27页。

②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实早已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如中国的《左传》认为其最大优点是能够强加于人,速战速决;^①再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所说“罪恶在萌芽状态最容易被消灭。”^②对罪恶采取先发制人打击是符合正义战争标准的,因此先发制人自一开始便打上了“强者战术”的烙印。

学界对先发制人的理论考察大体可分为四大研究领域——国际军事学、国际伦理学、国际法学和国际政治学。从国际军事学角度探讨先发制人旨在考察该战略的效能如何,即先发制人是否为消除外来威胁的最佳办法,如麦肯齐(Kenneth F. Mckenzie)所著《非对称性战争》(*Asymmetric Warfare*)等;^③从国际伦理学角度研究先发制人旨在考察该战略在道德层面的适用范围如何,能否为国际伦理所接受,如劳伦斯·达尔(Lawrence O. Dahl)所著《正义战争与先发制人战略的合法性》;^④国际法学界主要探讨先发制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它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如安东尼·阿伦(Anthony Clark Arend)的《国际法与先发制人式地使用军事力量》;^⑤国际政治学通常将先发制人放在“布什主义”、“新帝国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框架下进行探讨,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先发制人是服务于政治的手段而非目的,如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所著的《新自由帝国主义》、理查德·N.哈斯所著的《“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刘阿明所著的《布什主义与新帝国论》等^⑥。从国别研究来看,学界关注的焦点是世界和地区性大国,如美国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拟定发动的先发制人战争,美国于1986年和2003年分别发动的对利比亚空袭和伊拉克战争;苏联于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英国于1807年进攻丹麦^⑦、1982年发动的针

① 史向辉:《论〈左传〉中蕴含的战术思想》,《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64页。

② 崔之元:《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新保守主义与布什原则》,《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 参见 Kenneth F. Mckenzie, Jr., *Asymmetric Warfare*,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9; Sam J. Tangredi, *All Possible Wars? Toward a Consensus View of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1—2025*,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④ 参见 Lawrence O. Dahl, *Just War and Preemption Strategic Legitimacies*, Carlisle Barracks, Pennsylvania; U. S. Army War College, 2005。

⑤ 参见 Anthony Clark Are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eemptive Use of Military Forc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6, No. 2, 2003, pp. 89—103。

⑥ 参见 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Observer*, April 7, 2002; 理查德·哈斯:《“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陈遥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刘阿明:《布什主义与新帝国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

⑦ 英国认为丹麦同俄国结盟对其构成了确信无疑的、紧迫的威胁,参见 Howard M. Hensel, ed., *The Legitimate Use of Military Force*, p. 100。

对阿根廷的马岛战争等。

目前有关大国对小国先发制人战争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①但仍存在许多尚未回答的问题。第一,学界对先发制人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经验层面,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从理论层面来看,先发制人是如何执行的?决策者的主要考量点是什么?先发制人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些问题缺乏充分学理研究。第二,目前学界虽从国际军事学、国际伦理学、国际法学和国际政治学四个层面对先发制人展开了探讨,但笔者尚未发现从危机管理角度对先发制人加以研究的前期成果。与威慑外交和强制性外交相比,先发制人战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层面,缺乏安全战略理论作支撑。如何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解析先发制人战略背后的基本逻辑和运行轨迹,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三,从实证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将研究对象锁定在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大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上,忽视了先发制人战略的普遍性特征。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埃及、伊拉克、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也频频开展过先发制人战略,关于中小国家相互间实施的先发制人战略,目前的实证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

三、基本假设

迄今,关于先发制人战略有许多尚未解答的难题。第一,从危机管理的层面来看,先发制人战略具有怎样的基本特征和运作框架?第二,从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层面来看,影响先发制人战略实施的内外部动因有哪些,其主要变量是什么,次要变量是什么?第三,从实证研究来看,以西亚非洲的中小国家为代表的先发制人战略有哪些特点,其在实施先发制人战略时的考量点是什么,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实施先发制人战略时有何不同表现?是否威权国家如西方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更好战、更容易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第四,与谈判外交、威慑外交和强制

^① 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研究美国在中东地区先发制人战略的文章开始丰富起来,可参见 David C. Hendrickson, "Preemption, Unilateralism, and Hegemony: The American Tradition?" *Orbis*, Spring 2006, pp. 273—287; Ronald Bruce St John, " 'Libya Is Not Iraq': Preemptive Strikes, WMD and Diplomac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8, No. 3, Summer 2004, pp. 386—402; Peter Dombrowski and Rodger A. Payne, "The Emerging Consensus for Preventive War," *Survival*, Vol. 48, No. 2, Summer 2006, pp. 115—136。

性外交相比,先发制人战略的效能如何,是否为最节约资源的化解危机的手段?第五,在传统与非传统威胁相互交织的 21 世纪,先发制人战略对中国今后制定恰当的安全战略具有哪些启示意义?

先发制人战略的研究可以从实施者、接受者和媒介三个视角加以展开。限于篇幅,本书主要从实施者的角度考察先发制人战略,其基本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先发制人战略是武力在危机管理中的使用,是对外部威胁作出的反应。如果只考量威胁的临近性便可发现:当威胁较为遥远时,决策者常选择谈判外交与威慑外交;当威胁已转化为暴力,且对一国造成了伤害时,决策者常采取后发制人外交;但如果威胁处于迫在眉睫的“临界”状态,决策者往往会开展强制性外交,当强制性外交丧失效能时,先发制人便上升为一种战略。由此可见,先发制人是介于威慑外交、强制性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外交之间的“灰色地带”,它具有动态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此阶段威胁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见图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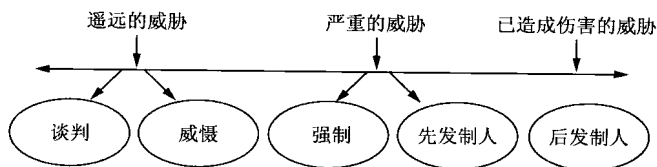


图 0-2 威胁临近性与先发制人战略选择

先发制人如何从众多的安全战略中上升为决策者的首选?这与先发制人战略实施动因有内在联系。实际上,该战略的运用与其说是一种军事艺术,不如说是一门政治艺术,其在实施的时机、范围、强度、方式、期限和规模等方面常常体现了决策者高超的战略艺术和政治能力,只有做到恰到好处才能收到预期效果。决策者是否选择这种战略取决于若干变量——促进该战略实施的动因(干预变量),即选择执行还是放弃先发制人战略取决于四个因素——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和权威性。

首先,必要性是指决策者对权力关系即将发生重大改变的心理认知,它产生于严重的威胁,决策者意识到本国的核心价值观、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政治—经济心脏地带即将随未来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受到严重损害。为化解这些矛盾,决策者不得不实施先发制人战略。

其次,可行性是指一国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并可分解为三个主要因素——军事实力、国内资源和盟友支持。一国的军事实力不仅取决于装备、军队